

萧乾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傅光明编 上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萧 乾 散 文

(上)

傅光明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乾散文/傅光明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043-2920-7

I. 萧… II. 傅…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982 号

书名	萧乾散文 (上、下)	规格	850×1168 毫米
作者	萧 乾	印张	40
编者	傅光明	开本	大 32
责编	李晓霖	字数	844 (千) 字
责校	陈丹桦	版次	1997 年 5 月第 1 次版
封面	李 萌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书号	ISBN 7-5043-2920-7/I·401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数	1—4000 册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定价	48.00 元 (全二册)

人生旅者：萧乾

傅光明

萧乾是中国现当代优秀的小说家、杰出的记者和出色的翻译家，他从一个孤苦的遗腹子，靠顽强的意志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自强不息，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到怡情悦性、洞达人世的晚年，越过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深沟高垒、巉岩荆棘。他始终以一种纯洁、高尚而热情的心灵，像常春藤一样顺着生命的根脉向上攀延。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有一颗勇敢而率真的灵魂，有一种洋溢着热情与温暖的自由精神。他有着六十年的文学生涯，创作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文学作品，而且他的经历充满了迷幻的传奇色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段漫长而沉思的生命实际上是一次不平凡的历险。

萧乾，原名萧秉乾，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东城北角一个汉化的蒙古族贫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孤寂、痛苦中度过的。出生时，父亲已过世，他不得不和寡妇妈妈在凄凉的“矮檐”下过着忍气吞声的艰辛生活。他放过羊，给人送过羊奶，还学会了织土耳其地毯。不幸的是，平生第一次领工钱那天，母亲在家中去世了。那年他十一岁。后来他把这段悲

惨的经历写成催人泪下的《落日》。

童年时代的痛苦经历造就了萧乾顽强、任性、敏感和忧郁的性格特点。他在十四岁时便开始在这个迷茫的世界上漂泊、流浪，虽曾朦胧产生过要当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愿望，却最终成了一个未带地图、自由翱翔的旅人。少年时期的萧乾，真像人生路途上刚刚起步的孤独长跑者，不知前边的路到底有多长，是否能到达尽头，只是执拗地向前跑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都不曾停歇。

1923年，萧乾入崇实中学半工半读。1926年初中毕业当北新书局练习生时，萌生了对文学的兴趣。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同到中国进行“冒险”的美国青年安澜(Allen)合编过英文的《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共出八期，到安澜赔光了积蓄为止。《中国简报》是最早向国外介绍中国现代新文艺的刊物之一，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933年11月1日，萧乾的小说处女作《蚕》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从此开始了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多带有自传色彩。他要用有形的文字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让读者同他一起分享那角世界的喜悦和悲哀。萧乾是写短篇小说的妙手，虽然缺乏契诃夫的深刻，却也自成一派，尤其带有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清丽和哀怨，富于诗意和哲理。青春的激情使年轻的萧乾难以平静，他浑身散发爱的狂热，梦想着浪漫迷奇的人生历险。恬静的晨曦，辉煌的薄暮，自然带给他和谐与庄严，令他流溢出绮丽的智慧；阴霾的云层，森凉的微雨，同样会激发他创作的灵光。哪怕自然界的一只昆虫，溪谷里飞溅的一朵小水花，都会被他赋予无限的生命力。至于现实人生的悲欢离

合、世态炎凉、温柔风雅，从童趣的天真世界直到虚伪的灵魂深处，更是他擅长捕捉描绘的。他能把几只蚕编织起充满象征意味的宗教爱情小说，能把失意的初恋写成伤感的诗意长篇《梦之谷》，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更使他的小说变得丰富多彩。

曼斯菲尔的小说笔触轻灵飘逸，文风素雅，结构纤巧，人物鲜活，很难见到人物众多、触目惊心的生活场景，也很少巴尔扎克、司汤达式宏大的构思；但她非常注重文字的色彩美和深刻的心理分析，在这之上，又往往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和哀怨。这些特点同样适用于萧乾的部分小说。再者，萧乾像曼斯菲尔德一样，常把小说当抒情散文诗来写，如《雨夕》和《俘虏》。曼斯菲尔德有些小说是透过儿童的眼睛、心灵去观察、感受周围暴虐的成人世界的。萧乾的有些小说如《篱下》、《矮檐》、《放逐》等均属此类。同时，德国小说家史托姆的《茵梦湖》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两部诗意小说给萧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茵梦湖》缠绵悱恻的感情抒怀，史托姆小说语言朴素优美，写景状物生动自然等特色，都注入过他的小说。在萧乾的小说里，常能发现鲜明的对应体：社会的丑恶与人性的纯美，污秽的世界与田园的美丽，世态的炎凉与儿童的率真。他往往在浓郁象征意味与深刻现实意义的交汇处，找到充满艺术魅力的契合点。

另外，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也颇有特色，充实了中国宗教题材小说的创作领域。他有着深厚的宗教情感，一直酷爱宗教艺术，欣赏宗教绘画，聆听宗教音乐，爱到空旷的教堂里领略庄严、辉煌和神圣。宗教也确实给他的早年生活带来不少欢乐。他自幼生长在宗教环境里，打五岁起，他的美国

堂嫂便教他一章一章地背诵《圣经》，他尤其喜爱赞美爱情力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但少年萧乾从宗教那里得到的却不是慰藉、圣洁和崇高，而是压迫、凌辱和创伤。他特别憎恨那些把宗教当饭碗的伪善基督徒，绝对相信《圣经》奇迹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教会。因此，《皈依》、《昙》、《鹏程》和《参商》主要是揭露基督教对中国人民精神的蹂躏，剖析虚伪教徒们的卑劣品行及其丑恶灵魂。

好的小说家必得具有诗人的性灵。萧乾正是位浪漫气息很浓的作家，具有诗人气质，忧郁、感伤而又乐观、宽容、豁达，对笔下众多备遭厄运的小人物，充满了热情的人道主义情怀。他深信浅薄的悲剧都比精致的喜剧更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所以，他的小说多在悲剧中苍凉地结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描绘充满诗意的田园情调。他对生活的观察细腻入微，能以诗人敏锐的目光，捕捉瞬间的意象，运用奇妙的联想、比喻，给自然客体和人物主体注入生命的艺术活力。他的小说优美而感伤，隽永而哀怨，把反映现实人生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萧乾小说的数量并不多，除了《梦之谷》，其余都是短篇，也不过二十五篇。但它们以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花苑献上了一朵奇葩。

萧乾的记者生涯最富传奇性。他于1935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以后，一直从事新闻采访、写作。鲁西、苏北大水灾，他写了《流民图》；滇缅公路一行，写成《血肉筑成的滇缅路》。1939年9月，萧乾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在英伦期间，他亲眼目睹了英国人民的沉着、幽默、坚毅和勇敢，躲过大批卅字飞机的轰炸，写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战时特写，如“伦

敦三部曲”《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银风箏下的伦敦》等。他还出版了四本英文著述：《苦难时代的蚀作》(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蚕》(The Spinners of Silk)、《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s the Blueprints)。同时，编辑出版了《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1944年，萧乾放弃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在英国报界云集的舰队街开办了《大公报》驻英办事处。不久，任随军战地记者，带着那枝神奇多彩的笔驰骋欧洲战场，随美国第七军挺进至莱茵河地区，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少数几位中国记者之一，向国内发回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新报道。后又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写成著名的长篇特写《南德的暮秋》。

萧乾的特写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语言朴素清新，是新闻的准确性与凝练的文学韵致情境的完美结合。他把作家的创作才华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全部糅进新闻特写的写作中，产生出极强的表现力。他的特写都是在实地采访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并善于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场景、画面，反映社会人生，反映时代生活。他较多地运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把自然界景物、人物感情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活脱脱地呈现给读者。他的特写被誉为文字的素描写生，从展示塞外社会民俗风情的《平绥线上》，反映鲁西、苏北水灾中灾民流离失所悲惨生活的《流民图》，再现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悲壮一幕的《刘粹刚之死》，讴歌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伟大创造精神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到表现战时英国社会面貌和英国人民在反法西斯

斗争中沉着、机智、幽默的民族精神的“伦敦三部曲”，以及反映战后德国、美国和瑞士的《南德的暮秋》、《美国散记》、《瑞士之行》，无一不显示出萧乾作为新闻记者的卓越才华。他描写战时欧洲的特写被誉为是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他的构思奇特，角度别致，剪裁精巧，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腻入微，把握人物的神态表情栩栩如生。他的笔简直如一架神奇摄影机，“抓拍”的镜头准确、新鲜、多样，“远景”宏阔、辽远、博大，“特写”则精细、绵密、传神。然后，便运用出色的语言驾驭才能，将这些鲜活、实在、亲切、自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构成意蕴深厚的人生画卷。萧乾的特写是中国报告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仅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民生疾苦，表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感情，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萧乾的杂文成就常被史家忽略，这也许因为其数量太少，全加起来也不过二十篇，但它们确实应在中国现代杂文创作中占重要的一席。萧乾写杂文的时间也不长，基本上只限于1946年回国到1948年这两三年间。他的杂文几乎全收在假托出自“拉脱维亚”流亡商人“塔塔木林”之手，1948年由观察社出版的《红毛长谈》中。当时，还真没有多少人知道作者的真实身分。

萧乾的杂文更多带有英国随笔的清淡和雍容，轻缓舒曼，游刃有余。萧乾经常在杂文里流露出异国情调的幽默，轻松俏皮之中透出清醒的深刻。萧乾杂文的笔法几乎都以反讽贯穿，抨击时政得心应手；但同时又常带有不少的抒情性，于不言自明的隐喻中表现对现实世界的鲜明爱憎。萧乾杂文的主题比较单一，主要是对当时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现实

进行讽刺揭露，同时，构想一个民主、和平、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萧乾杂文的成就以《红毛长谈》为代表，而它是特殊环境和特殊心理情绪交织的产物，不大可能具有题材、艺术、主题多重的复杂性。解放以后，写讽刺文章常要冒给新社会抹黑的危险，所以萧乾几乎没再写过杂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乾写于1957年的两篇杂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成了衙门》，竟使他成了“右派”。如果政治气候允许，萧乾也许会更充分地展现他接近狄更斯和亨利·菲尔丁的那种批判现实的讽刺、幽默才华。

1949年初，萧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作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他谢绝了剑桥大学的终身教职聘请，决心回到眷恋的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解放以后，萧乾主要从事向国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工作。他采访过妓女改造、土地改革，写成大型特写《土地回老家》。之后，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戴着“右派”帽子，仍与人合译了《汤姆·琼斯》，并化名佟荔翻译出版了《里柯克讽刺小品选》。“右派”摘帽以后，先后参加翻译了《战争风云》、《拿破仑传》和《麦克米伦回忆录》等。

萧乾获得平反以后，创作生命复苏，潜心回忆录和散文创作，先后出版了《一本褪色的相册》、《搬家史》、《北京城杂忆》、《负笈剑桥》、《八十自省》、《关于死的反思》、《我这两辈子》、《玉渊潭随笔》，长篇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和《萧乾文学回忆录》。

萧乾的早期散文多带有浓郁的象征色彩，如《破车上》里

那辆每天负着重物吱吱地行进在遥远崎岖的乡间土路上的“破车”正是当时中国的象征，“车破，它可走得动艰难的路。出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瘫倒，这才是中国”。尽管萧乾深知当时的中国还要像眼前这辆破车一样，艰辛地走很长很长的崎岖路，但他对祖国的未来命运还是乐观的。《叹息的船》以一艘瘫泊在江心喘息等待救助的船，暗喻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整个民族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又借船上各类人等的态度反射出国人面对暴风雨的不同心态。萧乾在此篇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国家的前途表示出忧虑和关切；民族不能在“叹息”中生存、挣扎，对英美所代表的西方不能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古城》是萧乾于“九·一八”的次年在闷郁中为当时的北平画的一幅素描，他把古城喻为一个臃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历史产生建筑它的伟人，又差遣捣毁它的霸主，在几番变乱中，它替居民挨过刀砍，受过炮轰，面前它又是怎样一份命运，没有人晓得”。这篇散文以低沉、伤感的笔调，透过象征、暗示，表达作者压抑、郁闷的心情和感时忧国的情绪。在《脚踏车的哲学》里，萧乾把象征性与现实内容糅合、交融，运用对比、烘托，使作品具有了更强的现实讽刺力。他对“骑车者”卑微心理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这里的人力车夫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为生存而辛苦地奔碌，而坐车者指军阀和国民党统治者，全然不顾百姓的疾苦、生死，实行专制霸道的统治。坐车人的身分愈高，车也愈恣意横行。那些骑车者（中产阶级）慑于汽车的淫威，或躲到人力车夫的背后，或一见警察的手势即刻躲到最安全的地带。萧乾在此着重讽刺的是中产阶级的油滑、世故，分析他们在大时代里微妙复杂的心态。守本分的溜到

路边，对汽车有畏惧心理，内心却发着不满的怨语。无能而又想出风头者，并没有坚强的脊骨，缺乏抗争的勇气，只求在“人力车夫”面前保持虚假的尊严和优越感，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坐车者”畏而远之，把灾难和牺牲推给受苦受累的劳动阶层，以期在心灵的扭曲下苟且偷生。

《雁荡行》实在是一篇难得的现代美文，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先生在提及此篇时称誉萧乾的散文“畅而美，富于想象，语汇清新，描写生动。在30年代兴起的新作家中，论才华仅有何其芳与他并比。以游记来说，读了他的《雁荡行》，郁达夫的山水记游更黯然无光了”。

萧乾在这篇散文里将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物象”与瑰丽多姿、奇幻无穷的“心象”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他没有沉醉于寄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里，而是注意把现实的人情世景交织在优美的自然山水画卷里，让你在和谐静美的田园牧歌情调下，不忘现实中那一声细微的呻吟。在萧乾用工笔重彩绘制的壮丽山水画卷上，奇峰耸峙，众壑纵横，巉岩峭壁，飞瀑直泻，充满了自然的光华神韵，流光溢彩。你可以随萧乾情绪的波澜，在你感情的屏幕上，再现光的闪烁，影的摇曳，那色彩、那形态、那情调、那神韵，足以使你在情景交融的意境中兴奋得快要狂癫了。可以说，萧乾用全新的语言，凭借新奇、丰富的比喻和想象，创新了白话游记文学的写作。

苏联著名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论及散文时曾有过一段精妙的论述，他说：“文学最高、最富魅力的现象，其真正的幸福，乃是使诗歌与散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散文充满诗魂，充满那种赋予万物以生命的诗的浆汁，清澈得无一丝杂质的诗的气息，充满能够俘虏人心的诗的威

力。”

萧乾的散文正有这种诗韵，这种魅力。他晚年创作的无论饱含象征意蕴的精妙短篇，还是普鲁斯特式追忆过去的长篇省思回忆散文，都是在以一个诗人的心灵去审视并感受人生，把沧桑岁月流逝中的蹉跎、体验、情趣和思想，化入俊逸舒展，厚重凝练的文字时空，由心底托出一颗虔诚睿智、挚情热烈的灵魂。这些散文达到了“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的美韵佳境，“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笔墨老辣，优美洒脱，富于睿智。它简约描述了萧乾所走过的创作历程、生活轨迹。他把自己喻为一道小小的浪波，它的寿命虽短暂，大海却是永恒的。他愿把生命的全部奉献出来，直到最后一滴。《在洋山洋水面前》抒写萧乾漂泊异邦、恋国怀乡的情结。离开祖国的七年里，他的心没有一天离开过故土。游子的心好比一只飘荡的风筝，不管飞得多么遥远，根却始终系在生养他的那片土地。从这里我觅到了萧乾在洋山水前的心境，他的灵魂深处深埋着民族感情的种子。剑桥绮丽的湖畔景色，浑厚妩媚的多瑙河风光，瑞士的清水秀水，都不能使他忘却祖国，忘却黄河，忘却古城。

《在歌声中回忆》写得饶有情趣，它用“歌声”把萧乾人生路上留下的印记串在一起，而且每一支歌都反映出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同时，那“歌声”也打着时代的特征。许多歌曲都带给他美好或痛苦的回忆。音乐在平时只是个爱好，遇上天灾人祸，它可以成为眷慰者。当年萧乾背着“阶级敌人”这顶黑锅在国营农场劳动时，便是自我沉浸在柴可夫斯

基《天鹅湖》的优美旋律里，以减轻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

《改正之后》是萧乾为自己画的一幅心境素描，以清新、口语化、不事雕琢的语言，描写他在反右、“文革”中眼见亲历的苦难遭际，剖析获得平反、改正之后的复杂心态。政治解冻了，知识分子的待遇日渐改善，萧乾也从由便池改建的门洞搬入新居。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冰释，在创作和言论上，依然心有余悸，步步设防，文章中还常有“冰碴”。

直到萧乾创作《透过活物看人生》、《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和《三姐常韦》等篇时，行文的开合，潇洒俊逸，真正到了“新老渐熟，乃造平淡”的境界。《透过活物看人生》是萧乾在与猫、狗的亲情和可爱的活物身上，交织出的人生回忆。他赋予活物以灵性，从中悟出自由人性的道理，并在活物的天性之中觅出人类的弱点。《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在强烈的宗教氛围里，流露出萧乾人性化的宗教思想。他小的时候由于眼见身受过吃教者的伪善和教会的虚伪，对宗教产生过强烈的抵触，他还写了《皈依》那样的“反教”小说，揭露帝国主义者把宗教当精神鸦片蹂躏中国人民的灵魂。但他始终没有对《圣经》和耶稣失掉一份美好的情感，他至今仍能背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关于“爱”的论述，并希望能把人格化了的上帝和纯美的自然结合交融在一起。

萧乾的短文平淡悠然，其妙却在于朴素宁静中见惊奇波澜。一件普通的生活中的小事，到他笔底，就常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文革杂忆》里，萧乾有意识地对那段灾难历史进行反思，所选细节虽小而又小，但极具典型意义，显得深沉、凝重。亲历过“文革”的人，读过这短而精妙的文字，一定会在心灵的巨大阴影下陷入深深的沉思。“文革”后

长大的青年，一定难以相信政治会把人的心灵扭曲到那种可怕的程度。

《北京城杂忆》里的十篇，有的文字幽默、活泼，有的俏皮、利落，显示了京白独有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萧乾在其中糅进了伤感的留恋和深刻的反省。萧乾要说明，他热爱今天的北京，城市建设正向着现代化发展，可他依旧怀恋老北京的城墙、城楼、各式各样的小吃、卖东西的吆喝声，以及民俗节日的热闹场面……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四周被高楼的森林所包围，古都建筑上的整体和谐被破坏了。他最感伤心的是，北京的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与现代化的都市建设太不调和，大大落后于物质变化。北京人读过这些杂忆，不知能否唤起一种荣誉感和作为人的尊严。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优美抒怀，像诗一样，富有音乐的节奏感，洋溢着萧乾热爱音乐，热爱生命的青春活力。音乐会使人永远年轻，音乐会使世界充满爱。每当他听到《桑塔·露琪亚》或《我的太阳》，就好像到了欧洲的苏杭。每听到《瓦妮塔》那支情歌，他就仿佛看到地中海两岸的少男少女在互吐恋情。反正几乎在所有他熟悉的每支歌曲的后面，都有一幅他曾经历过的生活情景。他把音乐视为直通人心的世界语，超越国界和政治之上，而且绝不随着政治变化减少其魅力。音乐带给过他兴奋、愉快的联想，也有悲伤、痛苦的往昔。他喜欢潇洒自如的调子，喜欢在音乐之声中神游世界。

萧乾晚近散文随意从容得宛若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晶莹、透亮，不见峰回路转，也没有柳暗花明，只是舒缓地从心底流出，具有一种魅力，引人不禁追踪而去，和他一起抚今追昔，感叹岁月，反思历史。我还特别喜欢萧乾晚年的这

一类散文，它们在极短的篇幅里以艺术的象征手法调配出深刻的思想浓度，他反复运用暗示、对比、烘托、联想和心理描写，藉着充满象征意味的客体形象抒写内心真实的精神生活，使言辞和意象达到一种和谐，作品在风格上也呈现出一种灵动之美。

法国著名文学家莫里亚克在小说中展示人类生活的戏剧时具有非凡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他认为：“我们人人都必须在孤独中面对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这是最终的孤独，因为我们最终都将孤独地死去。”凡人，因为他们终有一死，所以害怕提及死亡。而萧乾却在《关于死的反思》里，为死亡唱了一曲颂歌，他把死都抒情化了，通过自身亲历过的死亡体验，把对死亡的深沉思考，升华为对生命的崭新认识。“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对生命执著热烈的爱，远远超出了死亡的诱惑。死亡这个人类终极的前景，使萧乾看透了许多，懂得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他不再为什么所困惑，世界的一切对他都成了透明的。他对生命有了彻悟的领会：“物质上不论占有多少，荣誉的梯阶不论爬得多高，最终也不过化为一撮骨灰。”

《我的医药哲学》以小喻大，表面上看是借自己几十年患病就医所悟出的个中妙谛，谈养生之道、健体之经，实则观照的是处在大变革时期一个民族肌体的健康。国家得了“病”，绝不能盲目崇拜哪派医法。“良医必根据‘病人’的症候和体质下药。一种药治不了病，就应该试另外一种。不然，就是拿性命开玩笑。”换言之，即表明好的治国者应以国情国力各方面衡量自己的施政策略，一种政策行不通，可以再试

一种，切忌盲目“下药”。关键是先要“把五脏六腑理顺”，“治病之道，其实就是把五脏六腑关系理顺而已”。也就是说，治国之本就是使政府各部门协调运转，肌理通畅，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萧乾假托“便秘”与“腹泻”的辩证关系，有点黑色幽默地描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一旦改革受意识形态上“左”的思潮的严重束缚，产生便秘，“体内各种毒素杂质就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国将不国。相比之下，改革伴生的阵痛犹如“腹泻虽让人衰弱，丧失元气，而且肯定会使体内一些有益的营养也一道付之东流”，未免可惜。但这样同时可把体内有害的积淀倾泻出去，然后“只消点滴输液，吃点补品”，理顺阴阳，元气自会上升，国力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萧乾对民族肌体的丰腴健壮，满怀信心。这样一篇妙文，年迈体弱的老年人可获收益，学到“医经”，豪情勃发的青年不该从中得到深远的启迪吗？

《从心理学角度》就更具象征讽喻色彩了，萧乾从心理学角度探究人在社会风云、时代变迁和政治角逐中的众生相，他举出一些事例说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潜在的社会或变态心理作用下的行为，往往是畸形而沉重的。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里，有戴红箍的英姿少女硬把老师的头踩在地上，强迫背毛主席语录。还有的中学红卫兵先把教务长打死，并逼着校长抱死尸跳舞，结果是校长受不了那份侮辱，索性跳楼自杀。总之，不同的时代氛围、政治背景，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而“归根到底，心理就是士气和民心”。萧乾的深刻在于真正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借解放后恶性循环的政治风雨，“三反五反”、“文革”、“林彪事件”，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来揭示领导者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者“认识——再认识”和自我